

编者按

综

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活动方面，肯定因此而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心灵境界。他从不同类型的人的生命存在与心灵活动的广阔内涵出发，架构了弘大而辟的“三向九境”系统。在中西印哲学文化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唐先生特重中国哲学史的解读与重构，阐发其不同于西方、印度的特殊性。他指出，今天最圆满的人文主义史的

政治。徐复观先生比较重视经学与经学史，创造性地诠释礼乐文明。他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徐先生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他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多所弘扬。徐先生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他身上即体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的品格。

最后，说说第三代第四群的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

蔡仁厚先生是思想家与哲学史家。蔡先生以教书为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先秦儒家、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他弘扬乃师牟宗三先生“生命的学问”的路向，不废讲学，在平凡的学问生命中体现、光大民族文化的大统。蔡先生服膺唐、牟、徐“慧命相续、返本开新”的宗旨，其特点是最为平实、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从先秦到现当代的儒学之精义。他坚持第一、二代现代新儒家开辟的精神方向，把握儒学的常与变，讨论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以及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蔡先生有五阶段论，即先秦为中国文化原初形态的百花齐放，两汉魏晋为儒学转型而趋衰与道家玄理之再现，南北朝隋唐为异质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宋明为儒家心性之学的新开展，近三百年为文化生命之歪曲、冲激与新生。他认为，儒之为儒，不能由王者尽制的外部礼乐“礼教”来规定，而必须由圣著尽伦的成德之教“仁教”来规定，这才能确定儒家之教义与儒者生命智慧的方向。但礼乐文制也很重要，人文教化需要礼。蔡先生发愤考述孔门弟子之志行，又对荀子与朱子之“心论”的关系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从孔子到宋儒是蔡先生研究的重点，包括《中庸》《易传》形上智慧的传续与周濂溪的默契、洛学南传与闽学定位、湖湘学与胡宏“知言”、对朱子的理解、朱子与张栻的论战、朱陆异同与象山实学及对阳明学的疏导等。他重视性理学文献的疏导，讲

课时特别喜用自己创制的表式来显示义理脉络与系统的架构。他对韩国、日本性理学特有慧心，又深入研究了儒家之宗教性问题。他认为儒家之为教，是含具宗教意识，能表现宗教的功能作用，也能显发宗教的超越精神，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大教。他参与了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蔡先生大有功于现代新儒家前辈义理的阐述，特别是对牟宗三先生学行的整理与研究。

余英时先生是历史学家、思想家与思想史家。余先生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最高。他与其他现代新儒家不同，对现当代新儒家所谓“熊十力—系—牟唐及其弟子”等有过激烈的批评。但我仍坚持把余先生归于这个思想群体，乃是因为，余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严守现代学术本位，从历史学的径路，认真爬梳史料，严谨、深刻、具体地研究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儒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与生活方式的儒学的不同、传统与现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学的作用、中国传统价值系统在现代的处境等，回应韦伯问题及西方中心论的挑战。平题

形成、演变及性质，将理学放回到它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他讨论了“至”（世纪明清社会中商人的地位与思想，从绅商并提、士商相杂中，朱子的道德观念是怎样传播到商人身上的，商人是怎样巧妙地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儒佛等宗教伦理中的因素来发展商人精神即“贾道”的。也可以说，他是

中心理念与未来世界的相干性。`1培养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求同存异,向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团,同时要反对相对主义,肯定无形的理一是指导我们行为的超越规约原则。刘先生通过`两行之理`理一分殊`的新释,注入了新的信息,使之更具有现代性和现实性,肯定超越与内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的有张力的统一。他的研究,不单是哲学思想史的,尤其是哲学性的,是以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去解读、诠释古代哲学大家的思想遗产,发挥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近些年来,刘先生的工作重点是用英文把有关先秦儒学、宋明儒学和当代儒学的智慧、哲思及学术,通过自己的研究介绍给西方,这些英文专著都已在西方出版。总之,刘先生重视宗教对话,阐发了儒学的宗教意涵,推进并丰富了`内在`超越`学说,创造性地诠释`理一分殊`,积极倡导`两行之理`,发挥发展了儒学`仁、生生与理`之旨。

成中英先生是哲学家,国际中国哲学、儒学、易学研究的著名专家与组织者。成先生中西兼通,他的创造性成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全面把握中西哲学精神,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深入比较,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并把这些研究成果迅速地与西方哲学界交流对话,促进了中西哲学界的互动。`1创造性地建构了本体诠释学,融摄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洞见,尤其在本体`宇宙论、本体`方法论上继承、转化、发展了中国哲学。`1以现代视域,特别是以分析的理路在哲学各领域及哲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领域作出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在知识论`包括思维方式论1、伦理学`包括道德哲学、价值论1、美学、管理哲学`特别是把`周易`的哲学原理运用于管理科学1等四个方面都有建树与拓展。简言之,成教授在中西哲学比较、本体诠释学及真`知论1面式离穴禹在

学,与西洋思想,视为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把民主、自由、科学的现实诉求与传统文化资源、道德资源打成两橛。西化思潮曾经长期处于强势。近两百年来,中国人遭遇的是从社会结构到意义结构全方位的坍塌、解体,现当代新儒家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渗透的无所不在,变成海外汉学家列文森^{〔234561 78 95: 5; 43; 1〕}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所谓博物馆、图书馆或古玩。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完全坍塌。

在这种形势下,现当代新儒家的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到

到了重要的地位。孔子的这一思想有助于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与沟通。世界伦理宣言 能否为联合国所通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有关此问题的热烈讨论，实属客观需要、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当代新儒家学者努力参与了全球伦理的建构。刘述先在

越的价值理想追求,可以通过人的修身增德而在充满人间烟火的红尘中实现。这样一种超越,的确与西学中的超越有所不同。它不需要也很难得到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方式的证实,而需要的是儒者的身体力行,自证自信。

当然,

等等。读儒书，使儒家中人或新时代的儒者更加关心国事民瘼，更加关爱劳苦大众及其子女，更加敬业地投身教育、学术、文化等事业，更加积极地服务于社会，更加谦虚、慷慨、包容，也更有平常心和实践精神。此即所谓 极高明而道中庸 。

我认为，以儒家文化作为切入点和主要视域，来研究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贯，可深化这一主题。但我绝不排斥，相反非常希望其他学者以道家、佛教各时段的地域、民族、民间文化等为支点或领域来研究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贯。毋宁说，这适成一种学术生态的互补关系。

有人说儒家是所谓 泛道德主义者 ，这也是因为对儒家知之甚少所致。孟子曾说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 离娄上 1 儒家的范围甚广，很难归结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就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历史上真正的儒家从不阿附权贵，不是历代权威政治的附庸。虽然历史上不乏曲学阿世的陋儒，但这不是儒学的主流。儒家有以 天 或 德 抗位的传统和批判的精神，乃至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儒家在观念、制度及化民成俗的三层次中，有许多因素成为改善传统政治的良性的东西，这里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现代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与陶冶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资产。儒家的某些理念曾转化为传统社会的一些制度，有一些制度其实是值得我们反刍的，其中的价值常常被我们忽视。儒家有极为丰富的公共意识与公德心，其对公与私、公德与私德、公利与私利的看法，也绝非流俗所言，它当然也不可以归结为所谓的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 云云。

儒学不是博物馆或图书馆，也不是什么 孤魂 、 游魂 、 野鬼 。海外的一些汉学家、中国学家对现代中国社会非常隔膜。他们不知道儒学是生活，儒学有草根性。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之后，即使清末民初以来基本社会架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儒家仍活在民间，就在老百姓的生活 当下的生活之中，在社会大群人生的伦常之间，在日用而不知之中。我们当然希望把日用不知提升为 粵 粵 日、 农 农 韩望

壤。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特定时代的责任。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古人。让古人承担一切。对儒学采取简单抛弃、一味排斥、不讲道理的态度、轻率肢解、信口开河、或视之如寇仇的方式，是最容易做到的。但那是思想懒汉的做法。这种人没有担当意识。对于我们的有